

帷幄辞章

曾国藩文选



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朱东安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帷幄辞章：曾国藩文选 / 朱东安选注.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ISBN 7-5306-3295-7

. 帷... . 朱... . 曾国藩(1811~1872) —
文集 . 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4538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字数261千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19.00元

内 容 提 要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保住了大清王朝；他创立的军制，又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覆亡。誉之者称颂其“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中兴第一名臣、一代名将名相”；毁之者则指斥其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厘聚敛之风”，“以夷狄攻中国”，残杀同胞，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遗臭万年的“卖国贼”、残忍嗜杀的“曾剃头”、“曾屠户”。著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评价说：“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功耶？罪耶？是耶？非耶？任人评说……

本书选编了曾国藩不同时期不同文体共93篇文章，基本囊括其全部重要著作。每篇文章后均有题解和注释。并对曾国藩一生所作所为、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他的用人方略、历史作用和历史功过给予深刻透辟的分析和准确科学、实事求是的评价。

编辑前言

近代中国的历史，写满了耻辱。伴随着西方列强炮舰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国土被瓜分，主权被剥夺，民族尊严丧失殆尽，大量白银和无数珍贵文物流向海外；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充满着希望。即使观念最为保守的顽固派，也不再否认这一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落后了。而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人欺辱。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向外看世界。众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有识之士，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寻求疗治社会痼疾、摆脱民族危亡、富国强兵、解民倒悬的妙药丹方，掀起了持久的出国留学、越洋考察和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热潮，出现了一个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局面。长期被封建制度和传统观念束缚的思想得到解放，进化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制夷”、“共和”、“立宪”等各种思潮，以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再造民魂等各种主张竞相纷呈，划破了神州上空阴霾密布、黑暗沉闷的夜幕，重新点燃了民族振

兴的希望之光。

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当前，刚刚摆脱沉重的历史羁绊的中华民族，正以空前迅速的步伐，进一步走向改革开放，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新时代。尽管当前的国内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与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已大不相同，但我们的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文化教育、国防军事以及国民素质、文明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严峻的挑战，也并不比应付当年列强的枪炮来得轻松。落后便要受制于人，更谈不到真正的民族尊严。因此，认真吸取、借鉴前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深入开发、充分利用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是完全必要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少走弯路，使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得更快更稳。

为此，我们策划并编辑了这套“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本丛书选择中国近代史上曾在各个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产生过重要影响，或在某些方面成就卓著的人士，将最能体现其思想、代表其成就的文章、作品编为一集，人各一书。每书的前言，对其思想、主张、历史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客观的评价。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每篇（组）文章均通过题解介绍其背景、主旨、作用和影响。为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克服语言障碍，还对文中的历史典故、人名地名、有关事件、年代、风俗等语词和引文加以尽量详尽、准确的注释。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可；同时，更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对本丛书存在的问题给予直率的批评指正。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1年10月

前 言

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与古文学家，阅历较为复杂，留下的文字亦不少。这本文选基本上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他各个历史时期的言行，大致可以从中看出他一生的思想与功罪。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县）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依靠自身的努力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荐引，十年间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补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数年间接连兼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仕途的一帆风顺使曾国藩春风得意，对清政府感激涕零，一心要尽忠报国，干出一番事业。他在家信中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余三人”（《曾国藩全集·家书》，以下简称《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又说：“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不料，正当曾国藩踌躇满志之时，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这时，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种反清团体日益活跃，民众起义不断发生，全国已逞“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特别是发生在广西金田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当时清政府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兵无斗志，根本无力对付这场革命风暴。而以咸丰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上层，却对此并无深刻认识，这就使一批较为清醒的官绅士人愈感忧虑。

由于湖南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士林风气和历史传统，造就出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保守、务实、好斗，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关心整个地主阶级的命运，并把清政府的安危与自身利益结合起来。他们与曾国藩气味相投，通过各种关系联合起来。由于曾国藩的地位和声望，无形中成为他们的领袖。正是在这些人的激励和推动下，曾国藩在咸丰帝继位之初，乘下诏征言之机接连上疏，就国家用人、行政、军事及民间疾苦、平抑银价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对策，并对咸丰皇帝本人提出批评，企图推动他振作精神，励精图治，以改变清政府的被动地位。结果，这些精心写就的奏疏被束之高阁，意见不被采纳，且几乎因此而获罪。曾国藩在改革弊政的尝试失败之后，不得不别寻他途，以挽救清王朝的危亡。

咸丰二年曾国藩放江西乡试考差，行至安徽太湖，接其母病故讣告，遂改途返籍，为母守制。这时，清政府为阻止太平天国革命势力的发展，重施嘉庆初年故伎，企图用团练、保甲之法抑制太平军流动作战的战术。于是，就在太平军势力所及各省委任在籍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其人地两熟的条件，专门负责本省团练、保甲事宜。当时，清政府在全国先后任命团练大臣四十五名，曾国藩为其中之一。他就是利用这一半官半绅的身份，创建

了一支非正规的地主阶级武装力量，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并使勇营武装逐渐取代八旗、绿营的地位，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军事支柱。

曾国藩认为，绿营腐败已甚，不能担负镇压民众起义、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任务；团练、保甲组织面对统一、强大的农民军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要打败太平军，只有改革军制，另起炉灶，建立新军。他认为，绿营最大弊端在于“败不相救”四字，究其原因，一是平时薪饷太低，缺乏训练，技艺不精；二是战时东拼西凑，上下左右不和，调遣成法不善。于是，他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权归主将，层层选募，适当提高弁兵薪饷，变“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为近代军阀制度种下根苗。据《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估计，各省湘军人数最多时达三十万人，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约有十二万人。曾国藩就是依靠这支武装，采用以静制动、围点打援等战术，自上而下，沿江推进，逐步夺取太平军控制的长江沿岸城镇要塞，最后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为清王朝建立了第一功。

曾国藩攻陷天京的第二年，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剿捻遭到惨败，全军覆没，本人丧命。清政府又命曾国藩带兵北上，进剿捻军。捻军一改太平军固守城镇的做法，而采取大规模运动作战，马队为主，步兵为辅，行动迅疾，飘忽不定，一旦时机有利，就集中兵力杀个回马枪。山东高楼寨歼灭僧格林沁一战即用此法。故曾国藩有同捻军作战，不怕打不着，就怕打不赢之说。这样，曾国藩就不得不放弃以往驾轻就熟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在作战过程中逐步摸索战胜对手的办法。开始，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以堵为主的方法，马队练成后，又采用以快打快、追堵结合的方法，结果成效都不大。最后，不得不采纳淮军将领刘

铭传的建议，以防河为主，限定和缩小捻军的活动区域。这实际上正是他多年来一贯坚持的以静制动的军事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应用。历史证明，这一方法是相当有效的，其后继者李鸿章正是利用此法消灭了捻军，完成了曾国藩的未竟之业。然而，清政府这时却再也没有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的耐心，曾国藩的防河工程刚刚完成，一遇挫折，就采取前敌换帅的非常举动，使曾国藩灰溜溜地返回两江总督之任。

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任。上任不到两年，同治九年五月就发生了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即所谓“天津教案”。六月，曾国藩奉命赴津，查办此案。曾国藩面对外国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气焰，一点也没有攻打太平军时的那种劲头，一开始就悲观失望，低眉下气，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认定这次法国非来开战不可，无论如何让步都难以挽回局面，自己很可能要做叶铭琛第二。故出发前再次写好遗嘱，安排好身后事，大有一去不返之概。

本来这次教案是法国侵略者的蛮横不法引起的。法国天主教充当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开路先锋，以传教为名，多行不法之事。它收罗不少痞棍，如王三之类入会，又勾结武兰珍等拐匪，四处拐骗儿童，送给育婴堂收养，致使天津、静海等地多次发生儿童失踪之案，追查之中往往词涉教堂；与此同时，又在天津郊外发现多具儿童尸体，情景凄惨，大悖常理；加以育婴堂中多名儿童非正常死亡。人们遂疑为教堂虐杀中国儿童，哄传开来，引起民愤。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不得不查审此案。在查核事实过程中，曾引起群众在教堂门口围观，并因此引起围观者与教堂人员的口角。这本属寻常小事，稍做些工作，即可化解。不料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仗势欺人，蛮横逞凶，闯入

三口通商衙门大吵大闹，两次向通商大臣崇厚开枪，逼令崇厚派兵前去镇压，再次引起群众在通商衙门前围观。崇厚等人一再向丰大业求情，说明已派人前去劝解，若在群情激愤之时派兵前往，恐易激起变故；为避免引起冲突，又婉劝丰大业稍事体息，待人群散尽再走。怎奈丰大业不听劝告，一再狂叫不怕中国百姓，携带恶仆西蒙，气势汹汹地冲出大门。这时，天津知县刘杰已赶到通商衙门前，经他劝解，人们正在慢慢散去，见丰大业走出，急忙为他让开一条通道。若丰大业具有常人理智，不再逞凶寻衅，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不料丰大业再次向中国官员开枪，打伤刘杰的跟丁高升。群众忍无可忍，怒火喷涌，一发难收，当场殴毙丰大业、西蒙之后，又冲入教堂、育婴堂，搜出罪犯王三，救出被拐骗的中国幼童，混乱之中烧毁洋人驻华机构数处，造成二十人死亡。

显然，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勾结中国的卖国政府及各种恶势力压迫中国人民；其直接原因则是丰大业一再向中国官员开枪行凶，激起众怒。所以，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天津民众，不少王公贵族也认为百姓只知“护官”，不知身犯律条。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也不敢不顾是非，一味讨好洋人，一再指示曾国藩，拐骗幼童一事是天津教案的症结所在，一定要认真审理。然而，曾国藩却早就抱定“忍辱求和”之策，一到天津，即放走拐匪王三、武兰珍，并上疏清廷，为法国天主教堂的种种恶行劣迹辩护。他以为这样可以换取外国人相应的让步，为顺利办理天津教案铺平道路。岂知拐犯放出之后，法国人便以为中国政府手中再无他们的什么把柄，可以把责任完全推到中国方面，于是立刻凶相毕露，提出“三员论抵”的无理要求，即让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及偶过天津的

清军总兵陈国瑞为丰大业抵命，并扬言十几天内若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定将天津化为焦土。曾国藩被吓昏了头，虽然拒绝了“三员论抵”之说，但却将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并杀了二十名中国人为洋人偿命。据说，曾国藩抓不到那么多“正凶”，只好让天津士绅买人顶替，以凑足二十人之数。其实，当时法国已与普鲁士开战，并遭到惨败，根本没有力量进攻中国。

由于这次外交办理得过于软弱，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屈辱，所以曾国藩激起公愤，顿时成为众矢之的。那拉氏也乘机落井下石，说他文武全才，可惜不会办外交，将他调回两江，再次以其得意门生李鸿章取而代之，使他有苦难言，灰溜溜地离开直隶总督这一重要职位。这件事对他在精神上打击很大，使他既伤心又丧气，不到两年便郁悒死去。

曾国藩一生于镇压太平军、捻军与天津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外，所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兴办军事工业。他兴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使用的枪弹、火药，第二年又试制小火轮。同治二年造成木壳小火轮一艘，因速度太慢，尚不适用于战争。为造出更大、更好的军舰，曾国藩准备扩大规模，改进设备，择址另建新的兵工厂，故派容闳专程赴美，购买“制器之器”。同治四年机器运抵上海，交由江南制造总局使用。江南制造总局是由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合办的，最初只制造枪炮、弹药之类，供湘、淮军镇压捻军之用。同治六年，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后开始设立船厂，专门从事舰船的试制工作。同时，将制造局由虹口移至高昌庙，扩大规模，兴建一系列新厂，使之成为当时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另外，还在制造局内设立翻译馆，兼有科研、翻译、教育、出版等多种功能，为中

国发展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培养出大批人才。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建立新式海军做准备，曾国藩、李鸿章还向美国选派了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生，虽然由于后来美国人的背信弃义（不准中国学生进入军事院校学习）和清政府的眼光短浅，导致这次留学生派遣工作的破产，但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有意義的。江南制造局的船厂先后造出七艘小轮船。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和船厂落入李鸿章一人掌握之中，在其“造船不如买船”思想指导下，一改曾国藩“逐步试制，不断提高”的方针，停止制造新轮，专门从事轮船修理业务。这表明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军事工业的问题上，更向后倒退了一步。这是因为，曾国藩主张自己造船，虽对外国依赖性很强，但毕竟还可以培养一批科技人员、技术工人与企业管理人员，保留一点机器设备；而直接从外国购船，一旦战败，全军覆没，则连这点东西也留不下。

曾国藩在近代史上所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不仅由于他的上述“业绩”，更重要的还由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态度以及由此取得的成绩。曾国藩不仅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带头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洋务派的首领，而且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经世致用与古文方面的大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传统文化所造就出来的最后一批出色人物的代表，直至今日，在不少方面仍值得我们借鉴。

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各门各派都没有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包，择长而用。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大门派，相互间门户森严，党同伐异，互相争雄，各不相让。尤其义理与考据两派，甚至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曾国藩虽早年追随唐鉴讲习理学，但却并无一般理学家的门户之见，更不想参与两派间的门户之争。他在

给理学门户之见甚深的好友刘蓉的信中表明自己的治学志向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4、5页）

对于儒学以外的各派学说，曾国藩亦采兼师并用的态度。他认为，“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又说：“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求阙斋日记类钞》上卷，第20页）有时曾国藩干脆把诸子百家的各派学说说成是孔子的弦外之音、难以明言之意。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四日）甚至一向为文人所不耻的那些作为墨家后学的游侠、刺客，曾国藩亦认为其在不少方面，如舍己济人、薄利尚义、轻死重节等，皆与“圣人之道”相一致。他说：“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者豪侠之徒，未可深贬。”（《曾文正公杂著》第四卷，第4页）他就任直隶总督之后，又触景生情，一再赞赏侠义之风。

曾国藩对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各门学问都下过一番功夫。

早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就在同乡前辈理学家唐鉴的指导下钻研理学，精读《朱子全书》。次年又在倭仁的影响下，每天静坐自省，记修身日记，并将日记送唐鉴、倭仁批阅，与朋友一起讨论问题，交流心得，在士林中博得理学家之名。不过，这样搞了一段时间之后，终因紧张劳累，得了头晕吐血之症，在道光二十三年大病一场。从此，曾国藩只读理学家的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严于律己，修身养性，不再盲目模仿理学家的修身方法。也正因为这一点，使他成为与唐鉴、倭仁有所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理学家。他学宗宋五子（指张载、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而对理学与理学家又多有“微言”；处处以诚字相标榜，为人处事无不渗透着理学家的思想，而一生并无这方面的著述；且并不按照理学家的方式进行修身养性，而在封建道德的修养上却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又开始苦攻汉学。这年夏秋之际，他在城南报国寺养病，携带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一部随手翻阅。当时，熟悉考据之学的刘传莹也住在这里，以为考据之学“无当于身心”，正想学习理学，于是二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为好友。这样，曾国藩就大大拓宽了自己的治学领域，不仅学会了文字训诂，使自己的理学和古文学有了文字根底，而且进一步熟悉了中国的典章制度和统治阶级治国治民的经验，为自己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曾国藩研习经济之学大概是道光二十九年开始的。这一年他担任礼部侍郎，随后几年内又先后兼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为胜任本、兼各职工作，便结合自身业务，钻研各类经世致用之学。咸丰元年，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

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蔽，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或经济，在古代属政事之科，而今天则属于政治学。他自从军从政以来，练兵筹饷，南征北战，以至创办军工企业、办理江西与天津教案等，实际上都是钻研这门学问，并运用它来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他所以在近代史上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还是由于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曾国藩在书法方面也下过一番功夫。早在京宦之时，他就“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咸丰八年再出领兵，治军之暇，练字愈勤，“每日笔不停挥”，除办理各种文件之外，还要“习字一张，不甚间断”。经过几年的苦练，“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学，今竟能达之腕下”（《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只是由于他眼高手低，字体屡变，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先习柳（公权）体、赵（孟頫）体，欲得“两家合为一炉”，“只为欠缺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有志莫遂”（《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后又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师，“师羲之不可遽几，则先师欧阳信本；师欧阳不可遽几，则先师李北海。师献之不可遽几，则先师虞永兴；师虞不可遽几，则先师黄山谷”。原以为“二路并进，必有合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结果虽“用力亦不少，而时进时退，时好之，时不好之；时慕欧、柳，时慕赵、董，趋向无定，作辍靡常”（《曾文正公手书

日记》，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字体变来变去，终无太大成就。一般来说，曾国藩的字还是可以的，但尚未达到书法家的水平。

曾国藩兴趣最大、用功最深、探索最苦、自信心最强的是古文学。曾国藩自称“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显然，他是把这些书作为文学作品看待的。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京师南归，途经江宁，用借贷与典当衣物的钱买了二十三史。回家后其父曾麟书对他说，借钱买书我不怕，可以尽力想法替你偿还，你但能圈读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曾麟书的这些话对他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从此足不出户，在家闭门苦读了一年。他为了鞭策自己，还特地把他父亲的这几句话作为座右铭，限定进度，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不过，这时他对文学还不摸门径，也谈不上浓厚的兴趣，只是“奉命”而已。

曾国藩渐入古文学殿堂的门墙，是致仕以后的事。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在翰林院庶常馆修业期满，官授翰林院检讨。翰林院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这里的官员主要是读书养望，以备他日之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并无多少具体公务，除参加一些必要的应酬外，就是读书会友。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国藩借到一部桐城派首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一部明人归有光的《震川集》，从此刻苦攻读，钻研习摩，对文学产生了越来越浓的兴趣。后来，他在回忆自己治古文辞的过程时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辞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

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2页）又说：“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第15页）桐城姚氏后人姚慕庭也说：“吾师戴存庄孝廉入都，曾文正询古文法，存庄以《惜抱轩尺牋》告之。文正由是益肆力文章。”（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9页）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曾国藩在文学上初有长进，兴趣益浓，故在给刘蓉的信中称：“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12页）

曾国藩兴趣甚广，读书较杂，但多随兴趣而转移，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惟读古文书籍能坚持到底。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余在道光廿二、三、四、五等年用胭脂圈批”的书籍，惟有《史记》、韩文、韩诗、杜诗、《古文辞类纂》、《震川集》、《山谷集》数部“首尾完毕”（《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实际上，自道光二十三年以来，曾国藩已把理学放到次位，主要精力与时间都集中在古文方面。随着水平的提高，他对文学的信心也逐步增强。道光二十四年，他在家书中对诸弟说：“余近来读书无所得”，“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所成就”（《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数月之后，又更加自信地表示：“若如此做去，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但是，曾国藩没有能够成为一位专业文学家或学者。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晋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接着又先后兼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尤其自咸丰三